制度传统如何形塑国家？

——基于家户制和村社制的比较分析*

黄振华 王美娜**

[内容提要] 国家是历史条件的产物，并受到制度传统的深刻影响。制度传统对国家的形塑，首先表现为对国民性的塑造，进而建构起不同的国家形态及其特性。从历史上看，由于农民构成国民的主要社会阶层，国民性主要表现为农民性。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中国的家户制和俄国的村社制均为两国的本源型制度传统，二者在组织结构、产权属性、运行机制、治理单元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由此导致两国在农民性与国家性上的分殊。在农民性上，家户制下的农民表现为更多的自主性、积极性、弱势性以及个体性，村社制下的农民则偏向依附性、消极性、稳定性以及团体性。由于农民性上的差异，两国在基层治理模式、国家与乡村联结方式、现代国家建构路径等国家形态和特性方面呈现各自特点，进而形成不同的国家治理样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当高度重视长期以来形成的制度传统，并探索符合本国历史社会条件的国家治理模式与发展道路。

[关键词] 制度传统 国家形态 家户制 村社制

国家是历史条件的产物，并受到制度传统的深刻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① 因此，要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健全家户治理功能与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完善研究”（项目批准号：22AZZ007）的阶段性成果。

** 黄振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美娜，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

其重要途径就在于探寻中国国家形态演化的制度传统及影响机理。那么，何为制度传统？制度传统又是如何形塑国家的？为回答这几个问题，本文尝试从“农民性—国家性”的分析进路出发，以中国的家户制和俄国的村社制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围绕制度传统与国家形态的互动关系做一尝试性解答。

一 制度传统及其分析进路

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演化发展。作为特殊的公共权力，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经历了成长、发育、成熟的过程。^①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历史制度传统的差异，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特征，也形塑了国家不同特性。制度传统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制度规范和体系。根据徐勇教授的定义，传统^②是指能够对当今甚至未来发生影响的价值、行为和规范及与此相关的历史条件。^③对此，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有深刻见解：“在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影响。”^④在此，并非所有的制度传统都会对未来产生影响。从影响程度上看，能够对当下和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并长期发挥作用的传统构成“本源型传统”，这种制度传统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本源性，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也可以说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本体。^⑤

在构成制度传统的历史制度形态中，基础性社会制度构成本源型制度传统的重要来源。基础性社会制度是指将社会成员按照特定方式加以组织并形成基本社会单元的制度形态。基本单元是构成国家的最小“细胞”，是指组成国家机体的最基本、可独立的人的群体。在基本单元之下，不可再分为“独立的”群体或个体，群体或

① 徐勇、杨海龙：《历史政治学视角下的血缘道德王国——以周王朝的政治理想与悖论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② 在此，徐勇教授所界定的传统主要就是指制度传统，如家户制传统。

③ 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④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译者前言”第2页。

⑤ 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个体只是基本单元的构成部分，反映的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①基本单元是一个社会的根基，其性质和特征将会深刻影响包括国家在内的上层政治体系。对此，路易斯·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明确指出，“基本单元的性质决定了由它所组成的上层体系的性质”，“基本单元是怎样的，其复合体也是怎样的”。^②正如基因之于人体一样，有什么样的基本单元，就会有怎样的国家，二者具有内在的互构性。^③

由于历史社会条件的差异和时空的变换，组成国家的基本单元也有所不同，并形成了包括中国的家户单元、俄国的村社单元、西欧的庄园单元以及游牧民族的部落单元等多种基本单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家户制、村社制、庄园制、部落制等基础性社会制度。^④这些基础性社会制度构成各自国家最具深远影响的本源型制度传统，^⑤成为塑造国家形态的重要力量。本文的研究路径，便在于以中国的家户制和俄国的村社制为案例，对制度传统与国家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历史分析和比较。

制度传统是如何影响国家形态的？换句话说，制度传统形塑国家的路径和机制如何？围绕这一议题，学界的研究目前尚未完全展开。对此，本文尝试提出“农民性—国家性”的分析进路，以期对制度传统与国家形态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分析视角。本文认为，国家是由国民所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制度传统对国家形态的塑造，首先即表现为对国民性的塑造，进而建构起不同的国家特性。在传统时期，由于农民构成国民的主要社会阶层，所谓国民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农民性。在此，农民性可以界定为农民群体在心理意识、态度和行为模式等方面的总体性特征，是国民性在农民群体中的反映。制度传统之所以能够对国家形态产生作用，其重要原因正在于其对民情民性的持久影响。对此，托克维尔（Tocqueville）就曾指出“民情是一个民族的唯一的坚强持久的力量”^⑥。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中国人的气质》中将中国人的特性归纳为体面、节俭、力行、软弱的

① 黄振华：《国家治理的家户逻辑：基于田野政治学的分析进路》，《学术月刊》2021年第7期。

② [美]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34、273页。

③ 黄振华：《“家国同构”底色下的家户产权治理与国家治理——基于“深度中国调查”材料的认识》，《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4期。

④ 徐勇：《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⑤ 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⑥ [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5页。

强硬、保守主义、孝心、仁惠等诸多方面。^①徐勇教授则认为中国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农民理性”，包括勤劳、勤俭、算计、互惠、人情、好学、求稳、忍耐等，正是农民理性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与工商业社会结合形成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②

制度传统在塑造农民性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形塑国家形态及其特性，即本文所称的国家性。国家性可以理解为制度传统影响下国家治理所呈现的结构、样态及其特性，突出表现为制度传统与国家权力的互动过程及其结构形态。国家是合法垄断暴力的特殊公共权力，拥有超强的整合和改造能力。即便如此，长期形成的制度传统也不会国家权力面前轻易分崩离析，而是通过多种方式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并形塑特定的国家治理结构和样态。具体来看，制度传统对国家性的形塑包括国家的基层治理模式、国家与乡村的联结方式以及现代国家建构路径等不同维度。

基于“农民性—国家性”的分析视角，本文拟以中国的家户制和俄国的村社制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考察制度传统对于国家形态的形塑机理。本文的理论预设是：中国的家户制和俄国的村社制均构成两国的本源型制度传统，二者在制度要素构成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一差异形塑了两国各自的农民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塑了两国的国家性。从“农民性—国家性”分析进路出发，既可为考察制度传统与国家形态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分析视角，也可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厘定历史方位。

二 家户制与村社制：两种制度传统

中国和俄国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也形成了蔚为丰富的制度传统。其中，中国的家户制和俄国的村社制不仅是两国的基础性社会制度，而且构成两国各自的本源型制度传统，在国家演化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③对此，费正清在评价中国时就认为“中国是家庭制度的坚强堡垒，并由此汲取了力量和染上了惰性”，在他看来，“（中国的）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

① [美]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佚名译，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② 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

③ 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8 期。

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① 金雁等通过研究则发现，通过土地公有、税负共担、社员会议等机制，村社成为俄国基本的社会组织形态，也成为俄国人的精神家园，以至于“侵犯村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②。尽管家户制和村社制具有本源型制度传统的一般特点，但二者在具体的制度要素上又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导致两国在农民性和国家性上的分殊。

（一）组织结构

无论是家户制还是村社制，都是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前者以家户组织为基础，后者以村社组织为根基。两类组织在组织纽带、组织规模、组织稳定性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首先，从组织纽带来看，家户制是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其联结纽带主要为血缘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关系。”^③ 与之相比，俄国的村社最初则是由生活在同一区域、共同拥有土地的一个或几个村落的农民为着共同的利益，自我结合而形成的自治性社会联盟。^④ 因此，俄国村社的联结纽带主要不是血缘，而是地缘关系或邻里关系。^⑤ 其次，从组织规模看，家户组织的人口通常较少，尽管人们普遍希望维持数代同堂的大家户格局，但实际上中国乡村以四五十口人的小家户为主。^⑥ 与之相比，19世纪中叶的俄国普通村社一般由8—80个农户组成，人口为51—500人不等，农奴制改革之后村社人口增多，有时可达几千人。^⑦ 最后，从组织稳定性上看，家户组织由于规模小，极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地方战乱、国家政策、分家析产等因素都会导致家户的裂变和流动，从而使其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在俄国，村社人口规模较大，农民普遍附着在土地上，且附属于地主、教会和国家（沙皇），没有领主的同意和国家的认

① [美]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22页。

② 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9页。

④ 苑鹏、陆雷：《俄国村社制度变迁及其对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启示》，《东岳论丛》2018年第7期。

⑤ 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⑥ 黄振华：《国家治理的家户逻辑：基于田野政治学的分析进路》，《学术月刊》2021年第7期。

⑦ [俄]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族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18世纪至20世纪初·上）》，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2—453页。

可，村社农民不能擅自改变居住地和等级，从而具有极强的稳定性。^①

（二）产权属性

家户制与村社制不仅组织结构不同，而且在产权属性上也有明显差异。首先，从产权归属上看，家户制是以家户作为基本的产权实体单元的。在传统中国，虽然也存在个人产权，但个人产权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依附于家户产权。^② 在俄国，土地既不属于个人，也不属于家户，而是属于整个村社所有。^③ 相对于家户制，村社制在产权归属上具有“公有”性质。^④ 其次，从产权稳定性上看，中国家户内部的产权关系普遍是模糊的，并不存在截然两分的产权边界观念。但在家户与家户之间，产权边界不仅清晰而且不可侵犯，并由此形成异常发达的产权边界规则，从而强化了家户组织的产权实体功能。^⑤ 而在俄国，村社制土地产权是以“公有”形式呈现的，家户个体仅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并不拥有所有权。随着人口的增加，村社土地需要进行定期重分，由此增强了土地产权的不稳定性。最后，从经营模式上看，家户制以个体家庭生产为主要经营方式，家户拥有生产经营的充分自主权。即使是租佃地主的土地，佃户同样拥有充分的自主性，只需向地主缴纳约定的地租即可。在家户内部，生产由家长统筹并实行分工，普遍方式是“男主外、女主内”，从而形成“家长制下男女分工共管经济”。^⑥ 而在俄国，村社的重要特征是农民被强制聚居，形成在“公社主”驱使下的“一种农奴制集体劳作形式”。^⑦

（三）运作机制

家户制和村社制有着极为不同的运作机制。对于家户制而言，其主要以家庭

① [俄]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族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18世纪至20世纪初·上）》，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5页。

② 黄振华：《“家国同构”底色下的家户产权治理与国家治理——基于“深度中国调查”材料的认识》，《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4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7页。

④ 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⑤ 黄振华：《“家国同构”底色下的家户产权治理与国家治理——基于“深度中国调查”材料的认识》，《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4期。

⑥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附：拜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6页。

⑦ 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为运行单元，家长居于支配地位，负责处理内外事务。对此，费正清就曾指出，“（在中国）父亲是至高无上的独裁者，掌管并处置家里的全部财产和收入，对安排子女的亲事有决定性的发言权……法律许可他鬻儿卖女，甚或处决逆子”^①。林耀华则提出“家庭主权”概念，并将家长视为“主权者”。在他看来，“家庭的主权，操于家长之手，家产归他管辖，弟侄等只有遵从家长之命，分配职务，所有利润，纳于家长……家长在经济上是主权者，在外交上是代表者，家内人员行动，他要负责。在宗教上他是祖先崇拜的主持者”^②。与家户制不同，村社制是以村会作为权力机关的，村会是村社内各户家长的聚会。^③需要指出的是，村社制下“户”的原义为“宅院”，其居住含义超过血缘含义，而“家长”的原义则是“主人”“当家的”，其权力含义超过其辈分含义。从这个角度看，村会并不是亲缘单位的代表会议，而更多地带有份地经济单位会议的性质，也兼有宗法色彩下的“长老会议”的特征。^④在村社内部，几乎所有的重要事务都通过村会来决定。从运作过程看，村会决策严格遵循“多数决定”的原则，但并不体现或不考虑个人权利原则，“领袖的卡里斯玛魅力与群众的集体无意识是（村会）决策的重要因素”^⑤。

（四）责任单位

责任单位主要是指社会成员承担社会责任所依托的组织载体。家户制下，家户是承担国家赋税徭役的基本责任单位，家长承担税赋责任。“纳税、产权的支配、法律和秩序的维护，一直是家庭的责任而不是任何个人的责任。”^⑥同时，国家对家户生产生活、生命财产等给予必要的安全保障和社会救济，但个体家户具有天然的脆弱性，一旦离开家族互助合作与救济，很难长期生存和维系下来。因此，“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

① [美]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②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附：拜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6页。

③ 金雁、卜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

④ 金雁、卜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

⑤ 金雁、卜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

⑥ [英] 莱芒·道逊：《中华帝国的文明》，金星男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族而止”。^① 在村社制下，国家赋税徭役与社会救济的基本责任单位是村社，村社管理者承担财政和行政责任，租税征集“对社不对户，贫户所欠富户补”^②。自18世纪起，国家赋税徭役按照“村社一人头”来征收，村社范围内实行连环保，村社管理者为大家作保，大家为管理者作保，村社赋税、役租或应服劳役总额确定后，村社根据农户支付能力将赋役总额摊派给各个农户。^③ 此外，村社具有合作、慈善职能，包括生产上的互助合作，灾荒时给予粮食救济，救济孤寡老弱，开办学校、医院，建立公共粮食库等公共设施。^④

综合来看，中国的家户制与俄国的村社制尽管都具备本源型制度传统的基本属性，但却在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表1所示）。这种制度要素上的差异性，成为塑造两国农民性的重要来源，也导致了两国在国家治理样态和特性上的差异。

表1 家户制与村社制的制度要素比较

项目	制度要素	家户制	村社制
组织结构	组织纽带	以血缘为主，地缘次之	以地缘为主，血缘次之
	组织规模	以家户为单位，几人至十几人	以村社为单位，几百上千人
	组织稳定性	相对自由	强制聚居
产权属性	产权归属	家户私有	村社“公有”
	产权稳定性	固化稳定	定期重分
	经营模式	家户个体经营	村社集体协作
运作机制	管理核心	以家庭管理为主	以村社管理为主
	权力主体	以家长为主导	以村会为主导
	管理范围	全部家庭事务	全部村社事务
责任单位	税赋承担	以家户为单位，独立承担	以村社为单位，贫欠富补
	社会救济	家族救济或自助团体	村社救济

① 《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40页。

② 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

③ [俄]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族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18世纪至20世纪初·上）》，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8—459页。

④ 张广翔：《俄国村社制度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4期。

三 制度传统与农民性的塑造

由于家户制与村社制在组织结构、产权属性、运行机制、责任单位等方面的差异性，导致两国在农民性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农民性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渐进演化的特征，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农民性所反映的是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总体性倾向，而非具体的社会个体属性。就此来看，制度传统塑造下的农民性，主要表现为一种相对的社会群体倾向和特征。

（一）自主的家户与依附的村社

自主是个人意志自由的道德概念，指人在正确认识和自主选择的基础上，自己控制自己的行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处理和支配事物的能力。^①从历史上看，家户制形塑了中国农民更高的自主性，村社制则形塑了俄国农民较强的依附性。首先，从人身自主性上看，家户制以血缘为纽带立户、按地域划分居民户籍，农民和个体家庭摆脱了对氏族、家族和宗族的人身依附关系，平等享受国家依照居住地赋予的公共权利与义务，包括占有土地、人身自由和纳税、服兵役等。^②“在村庄共同体和日常生活之中，农民在人身上是自由的，具有自主性……地主只是‘地’的主人而不是‘人’的主人。”^③而在村社制下，领主拥有对农民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社会权力和司法权力，终身和世代占有农奴的土地和人身，农民无法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劳动和精神，高度依附于村社。“村社成员视自己是集体和国家的附属物。”^④“不论是何种组织形式的公社，社员都不得任意迁居。理由是全部土地包括宅基地均归村社所有，因此不经过村社同意是不能自择宅址的。实质上，这是‘公社主’们借公社‘集体主义’来限制、剥夺农奴——公社

① 宋希仁等主编：《伦理学大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5—416页。

② 徐勇、叶本乾：《关系叠加视角下的家户制政治形态——以传统汉族地区家户社会为基点》，《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③ 徐勇：《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兼评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东方专制主义”》，《学术月刊》2012年第4期。

④ 尹绍伟、崔正领：《浅析俄国村社制度的演化》，《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社员的人身权利，便于其控制与管理而形成的习惯法。”^① 其次，从经济自主性上来看，农户拥有农民生产生活所依赖的两个支柱，即“人和土地”，^② 农户土地、劳动工具、劳动力等均可独立经营、买卖、租佃和继承，农民始终以农户为本位，具有意识、目标以及行动上的自主性。^③ 而俄国村社土地产权公有、定期重分，农民无法独立经营、买卖土地和生产工具，无权获得和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不具有经济自主性。“中世纪的农奴是束缚在土地上的，他自己既不能离开也不能出卖土地”^④，“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⑤ 也导致俄国农民没有任何向外界寻求经济发展的渠道与路径，从而使得俄国农民在经济上更具依附性。

（二）积极的农户与消极的村社

长期形成的制度传统会对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产生持久影响，这对农户制和村社制而言也不例外。首先，农户制赋予中国农民更强的生产积极性，村社制下的俄国农民则相对较为消极。具体表现为，在农户制下，农民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拥有完整的农户产权和对劳动产品的支配权，更有可能激励农民通过精耕细作改善生活境况，甚至改变命运。由此，也塑造和锤炼了中国农民的勤劳品质。正如《吕氏春秋集释·士容论·上农》中所载述：“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而村社制遵循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无论勤奋和懒惰，农民都能得到村社同等的照料，“人自生出娘胎就有他该得的一块面包”^⑥。因此，他们在创造社会财富过程中缺乏内在激励，也难以改变自己的生活 and 命运，表现为缺乏致富动力的“消极小农”，形成“别太靠前也别太落后”的生活习性。^⑦ 其次，从制度结构上，农户制赋予农民更充分的行动自由与社会空间，村社制下的农民则相对更为消极。具体表现为，农户制条件下国家与社会成员的关系主要是

① 金雁、秦晖：《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②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③ 黄振华：《国家治理的农户逻辑：基于田野政治学的分析进阶》，《学术月刊》2021年第7期。

④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1页。

⑥ [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族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18世纪至20世纪初·上）》，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页。

⑦ [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族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18世纪至20世纪初·上）》，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476页。

赋税徭役关系，个体成员只要缴纳了赋税便拥有相对独立的自我治理空间，所谓“纳完税，自在王”^①。而且家户制下中国农民没有严格的身份等级限制，面对暴政苛政有揭竿起义的合法性，可以“替天行道”，要求“均田地，等贵贱”^②。而村社传统塑造的是“村社民主”^③，俄国农民对集体主义的崇拜具有压抑个人理性的偏向，“有时会体现为一种缺乏‘真宗教’精神的宗教狂热”^④。同时，俄国农民与其他社会等级间有森严的等级壁垒，当官方法律与农民习惯法背离时，农民的行为对政府和地主而言并不具有合法性。^⑤此外，俄国不同阶层的社会规范也互不相容，个体农民的行为一旦偏离村社公认规范，就会被村社的社会监督与惩罚体系予以纠正。因此，俄国农民在政治行动上既无官方“合法性”，也无社会空间，显得较为消极。

（三）流动的家户与稳定的村社

流动与稳定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与游牧社会、西方商业社会的高度流动性相比，东方农业社会具有稳定性，但农业社会中的人也不可能完全固定在一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土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⑥因此，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东方社会内部也具有流动性与稳定性的相对差异。其一，从横向空间流动来看，家户农民有人身自主性，因而具有更多自主流动的可能；村社农民被强制聚居与劳作，相应只能固定一地，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同时，面对外部环境冲击，脆弱的个体家户极易成为流民，而村社农民依附于村社集体，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从而稳定性更高。其二，从纵向社会流动来看，家户农民跨阶层、跨等级的社会流动远多于村社农民的。家户农民通过勤劳致富或者读书入仕，均有可能突

① 黄振华：《编户齐民与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态的构建》，《中国政治学》2021年第1辑。

② 徐勇：《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兼评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东方专制主义”》，《学术月刊》2012年第4期。

③ 金雁、秦晖：《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

④ 金雁、秦晖：《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页。

⑤ [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族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18世纪至20世纪初·上）》，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1页。

⑥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页。

破阶层和地位的限制，进入更高的社会层级。“在中国，许多地主得以成为地主，就是依靠从事工商活动积累的资本。”^①“要出人头地就只能做官……家里再穷也要让子女读书，或者家族供养一个有可能出人头地的学生。”^②相对而言，村社制有着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农民是最低等级，除非获得地主或国家的准许，否则没有制度路径支持农民跨阶级、跨等级社会流动。加之村社管理体制及宗法式思想体系，不仅抹杀了农民流动的制度空间，更奴化了农民跨阶层流动的意识，“个体家庭的发家致富甚至成为一种耻辱”^③，“在农民看来，稳定比效率更重要，稳妥比进步更重要……手里的麻雀胜过天上的仙鹤”^④。

（四）个体的家户与团体的村社

马克思精辟地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⑤从家户与村社的关系来看，家户无疑更具有个体化的取向，村社的团体化特征则更为凸显。其一，从历史演化进程看，家户制是国家拆解宗族村社与宗法隶属关系、强化税收汲取能力的产物，塑造的是个体家户与个体农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直接反映了家户的个体化倾向。而村社制产生于“宗法式的停滞的社会中对联合的狭隘需要”^⑥，塑造的是束缚于“封建的共同体形式”的宗法农民，他们具有崇拜集体权威、求庇于村社共同体等宗法倾向。^⑦其二，从社会文化建构看，家户制是以“祖赋人权”的本体原则构建的一套关于个体成员的位置、权利与责任体系，强调的是个人“各得其所”“各尽其力”的正义。^⑧家庭中无论哪一种关系都是由一个

① 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② 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③ 徐勇：《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④ [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族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18世纪至20世纪初·上）》，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4页。

⑥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

⑦ 金雁：《村社制度、俄国传统与十月革命》，《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⑧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6页。

成员对另一个成员的责任和义务观念所支配。^① 如果一个人履行了指定给他的那部分职责，他可期望这一体系内的其他成员反过来也对他履行他们应尽的职责。^② 相比之下，村社制是遵照“集体精神”与平均主义构建起来的，强调的是个体农民与村社间利益一致、社会共质且有机统一的团体关系。村社农民依靠口授与直接传授的方式进行文化代际传承，依靠严厉的社会监督使农民“自我”变成“我们”。“无论在穿着、发式、住宅的摆设上，还是在其他任何方面，农民都不追求时髦……表明个人没有追求个性、追求与众不同的渴望……在涉及整个村社利益的问题上，农民的行为被严格规定，拒不接受的现象极为罕见。”^③

四 制度传统与国家性的塑造

国家是由广土众民所组成并受到社会基质深刻影响的共同体。家户制与村社制不仅塑造了两国不同的农民性，也必然会对由民众组成的国家形态及其特性产生深刻影响。具体来看，至少包含三个维度：一是制度传统对基层治理结构与形态的影响，反映的是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方式与互动关系的差异；二是制度传统对国家与乡村联结方式的影响，表现为国家与社会联结路径的差异；三是制度传统对现代国家建构路径的影响，表现为现代国家建构方式的差异以及国家介入社会能力的分殊。

（一）国家的基层治理结构

国家对基层的治理是以一定的人的群体作为基本单元的。基本治理单元的性质决定了由它所组成的上层体系的性质。^④ 家户与村社作为两种不同的基本治理单元，使得两国在基层治理结构与形态上也呈现出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家户制条件下的基层治理结构呈现为家户自治，而村社制条件下的基层治理结构则是典型的村社自治。在中国，“家户作为融社会、经济和政治于一体的单位，具有强大的自组织和自治功能……家庭是一个由于时间序列不同而形成的纵向组织单位，

① 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薛刚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

②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③ [苏]波·尼·米罗诺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王清和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④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34页。

由此形成家庭内部的老人权威和长幼有序的秩序……这种权威和秩序是内生的，并内化于家庭成员的精神之中，具有强大的自治力量”^①。家户拥有先赋性血缘优势、组织优势、完备的社会功能，是国家治理基层的基本责任主体。^② 相对于家户而言，中国的村庄并不是独立的行政和自治单元，村庄公共事务普遍以家户为单位进行。正如摩尔所言：“中国的村庄与其说是生活和功能性的共同体，还不如说是许多农家的聚居地。”^③ 与中国不同，俄国的村社既是农民的自治组织，也是官方的基层行政单位，政府的意志通过成为村社的意志得以付诸实施，其核心管理机构是村社大会。^④ “从行政警察的角度来看，村社也更加方便，放一群牲口，总比一头一头地放来得轻松。”^⑤ 在俄国习惯法中，村社大会的“一致同意”是通过任何决定的前提，虽然原则上每位与会者拥有否决权，但人们轻易不会使用。^⑥ 在村社制中，农民被束缚在村社体制下没有自我选择权，村社决定着农民的所有事务。^⑦ “人们将村社视为至高无上和万能的存在，谚语说‘米尔不受任何人的审判’，‘米尔只受上帝审判’。”^⑧

需要指出的是，家户自治与村社自治尽管都表现为一种自治形态，但不同的制度传统导致两种自治的性质和强度有所差异。在家户制条件下，基层社会抵御国家的能力较弱，家户自治更多表现为一种国家“监控”之下的“软自治”。这种“软自治”无法形成可与国家权力相抗衡的力量，更多表现为国家控制之下的“简约治理”。而在俄国，村社不仅是外在的公开化的官方组织机构，也具备内在隐蔽的非正式结构组织。“它由非官方的价值和规范以及由习惯和传统所构成……保证非官方的村社方针得以实施。”^⑨ 这意味着，村社具有自我治理的充分正当性

① 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② 黄振华、常飞：《家户与宗族：国家基础性治理单元的辨析及其逻辑——基于“深度中国调查”材料的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③ [美]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页。

④ 张广翔：《俄国村社制度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4期。

⑤ [俄] 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张开译，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92页。

⑥ 张广翔：《十九世纪俄国村社制度下的农民生活世界——兼论近三十年来俄国村社研究的转向》，《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⑦ 苑鹏、陆雷：《俄国村社制度变迁及其对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启示》，《东岳论丛》2018年第7期。

⑧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⑨ 张广翔：《俄国村社制度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4期。

和合法性,是一种自治强度很高的“硬自治”。对此,政府就需要有意识地避免官方法律和村社习惯法之间产生分歧和冲突,并有目的地利用符合法律的习惯法,以便于在村社保证政策的推行、赋税的征收以及警察和行政职能的实现。

(二) 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联结方式

国家要实现对疆域的治理,必然要与乡村社会建立起有效的联系。在家户制和村社制下,国家与乡村的联结方式和路径有很大差异。在家户制下,国家政权直接掌握国民,联系更为直接,形成了国家对乡村社会及民众的纵向支配关系。这一联结机制,早在秦汉时期便通过“编户齐民”制度得以确立,从而使得个体家户直接享有并承担国家依照居住地赋予的公共权利与义务。^①“编户齐民”并非一般意义的人口信息制度,而是确立国家责任的重要机制。对于每个户籍单位来说,只有承担一定的国家责任,才能获得相应的国民身份和权利。对此,徐勇认为:“‘户’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组织单位……‘家’是经济社会单位,‘户’是政治单位。‘户’的出现具有革命性意义,这就意味着个人从狭隘的地域共同体走了出来,成为更大的共同体——国家的成员。”^②通过“户”的建构,国家对广土众民的纵向支配大为增强,并为“大一统”集权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③“户籍的编排、登记与管理,是与正在形成的集权制国家的军事、治安、赋役制度联系在一起,反映出国家对民众的控制得到了全面的加强,从而为专制主义集权奠定了基础。”^④此外,“户”的设置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国家政治体系紧密联系的。从社会基层来看,国家主要通过乡里制度将家户单位联结起来,形成以“户”为基础的社会控制体系。通过乡里制度,国家将家户单位进一步整合起来,使之成为国家严密控制的对象。“‘分家立户’……是帝制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皇权从中央,经由郡县,到达乡里,一直延伸到家户,大大提升了国家对社会的纵向渗透和控制能力。”^⑤“通过郡县、乡里和户籍以及连坐、告奸等制度,

① 徐勇、叶本乾:《关系叠加视角下的家户制政治形态——以传统汉族地区家户社会为基点》,《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② 徐勇:《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③ 黄振华:《编户齐民与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态的构建》,《中国政治学》2021年第1辑。

④ 鲁西奇:《“下县的皇权”:中国古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⑤ 徐勇:《关系中的国家》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08页。

千万小农被纳入了政府的紧密控制之下。”^①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村社制下由于村社具有实体性，从而将国家与个体分割开来，国家无法直接掌握农民个体，体现为一种间接的联结方式。从起源上看，村社制是自然—人文环境下劳动共同体内生性演变的结果。它“把古斯拉夫人的封闭性、维金人的宗法自治、拜占庭的邻里公社及蒙古人巴思哈制度下的连环责任制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以强调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为特征的宗法文化”^②。“宁可全部土地归沙皇，只要不归地主”的村社观念，直接导致了俄国式的皇权主义的产生。受宗法共同体传统思想的影响，“俄国人始终认为，一旦享有了控制权，就应当承担起关心、帮扶和庇护被控对象的责任”^③。由于传统国家能力不足，导致国家行政机关将乡级公社作为基层行政机关并与之保持直接联系，村级公社由此获得政府公认的自治权。对于农民而言，与国家或其他公社以及任何公社之外的个人之间的联系都须通过村级公社或公社领导人来实现。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俄国的村社仍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富有生命力的机构，它能满足农民的需要，符合农民关于社会组织的理想”^④。

（三）现代国家建构的路径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与国家的双重建构过程。家户制与村社制的制度传统与惯性，不仅深刻影响了民族国家建构的方向，同时也对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一，家户制是帝制时代的产物，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通过“破家立国”的方式实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家户制的政治社会基础。相比之下，村社制先于国家政权而存在，“平均”的剥削与“民主”的专制，一体两面地孕育了俄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动力与冲突，并长期伴随其现代国家建构，具有很强的延续性。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组织，通过土

①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② 金雁：《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冲突》，《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③ [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族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18世纪至20世纪初·上）》，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7页。

④ [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族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18世纪至20世纪初·上）》，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7页。

地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全面改造农村基层社会，使村庄而非家户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基层组织。“土地改革和税率的提高使国家政权空前地深入自然村。旧日的国家政权、士绅或地主、农民的三角关系被新的国家政权与农民的双边关系取代了。”^① 杜赞奇也指出：“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它从基层开始建立了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各级组织。……偷税漏税和贪污中饱直到20世纪50年代实行合作化后才得到最后解决，它使征税单位、土地所有权和政权结构完全统一起来。合作化从政治和经济上均实现了‘政权建设’的目标。”^② 相较而言，俄国的国家建构以亚历山大二世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为开端，在渐进、积累性的改革中逐步废除农奴制，转变国家经济结构，但其建设过程颇为迟缓乃至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下，村社被保守人士和社会主义者认为是“俄国的独特性”，社会主义者甚至将村社视为“社会主义胚胎”。^③

其二，由于家户缺乏与国家政权相抗衡的能力，所以中国的现代国家对基层社会始终保有较强的控制能力。相较而言，村社制具有社会与经济职能的二重性，国家政权对其难以消解，以致俄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接续性地植根于村社制度传统之中，并且依赖村社管理土地、获取税收与资源，导致国家政权介入乡村社会的能力始终较弱。在具体途径上，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首先表现为对农民经济权利的控制和改造。^④ 在黄宗智看来，“（共产党）政权远不止是个征税者；它意在控制农村的商业，并掌握每家每户的经济抉择权。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新政权不仅把触角纵向地伸入农村，而且横向地扩展权力”^⑤。这意味着，国家权力可以随时介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领域，但并不必然介入其中，具有“全能主义”的突出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家户制也不断为国家政权所改造，从“破家为国”到争取个体自由，家户制在当代社会日趋消解。而俄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首先表现为对村社体制的有效继承。张广翔指出，“将1861年改革后的村社同改革前的村

① [美]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3页。

② [美]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

③ 张广翔：《十九世纪俄国村社制度下的农民生活世界——兼论近三十年来俄国村社研究的转向》，《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④ 黄振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四个视角——基于相关文献的检视和回顾》，《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⑤ [美]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7页。

社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村社的结构和职能未发生任何重要变化，不仅未背离改革以前制定的村社生活原则，相反却更严格、更灵活地实行了这一原则”^①。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也强调“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②。并且，在苏联时期也并未彻底否定村社制，其社会生活中仍然延续公社制度，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国有企业等生产组织，甚至恢复了国家的专制体制和传统统治方式。苏联解体后，地方自治权力纳入宪法，村社实行自治而不受国家政权的强行介入和控制，正式获得宪制保障。^③

五 结论与启示

历史比较是一种认识工具，它将不同的对象置于同一时空下进行比较，发现各自的特性。^④从历史比较的分析范式来看，中国和俄国受各自历史条件的制约，在国家形成和演进的历史节点与特性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历史上看，俄国社会以“共产制家庭公社”时期的村社为源起，村社制成为国家的历史根基与基础性制度，而中国由宗族集体村社过渡到“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⑤后才形成国家，家户制成为国家的基础性制度。本文基于“农民性—国家性”分析框架，将中国和俄国置于历史传统与国家进程的广阔时空之下，比较分析其各自特征。研究发现，家户制下的农民，具有更强的自主性、积极性、流动性和个体性；村社制下的农民，则具有相对的依附性、消极性、稳定性和团体性。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基层治理以家户自治为核心，形成“国家—家户”的直接联结路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以革命、回归、调适的方式不断形塑新时代的家户传统与基层自治模式，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介入能力也不断强化。而俄国的基层治理以村社自治为核心，形

① 张广翔：《十九世纪俄国村社制度下的农民生活世界——兼论近三十年来俄国村社研究的转向》，《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9页。

③ 陈福胜：《俄罗斯地方自治与公社传统》，《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5期。

④ 徐勇：《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

成“国家—村社”的间接联结路径，国家政权建构接续性植根于村社制度传统之中，并且依赖村社管理土地、获取税收与资源，导致其介入和支配乡村社会的能力较低。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制度传统形塑了一个国家特有的农民性与国家性，这既是长期历史延续的结果，也是未来国家发展和演进的历史起点与条件。其使得个人、社会与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和状态走出狭隘的地域，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之中。19世纪以来，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家户制传统与帝制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949年，中国共产党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传统帝制国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及相应的制度体系。由于对家户制传统的积极因素认识不足，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抛弃了家户制，并以人民公社体制代替之，结果导致国家建设遭遇曲折。直到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激发了个体家户在生产经营与乡村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并成为“中国奇迹”的坚实基础。相较而言，19世纪俄国被卷入世界体系，村社制并没有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彻底瓦解，而是不断地以改革的方式适应于市场经济、城市化与现代国家进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村社精英不可避免地离开村社，但村社共同体的精神与实体仍十分强大，众多农民仍然依赖村社。总体上看，无论是中国还是俄国，只要制度传统及其形成条件仍然存在，只要历史传统还可满足国家与社会的内生性需求，历史传统就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当然，随着现代国家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家户制与村社制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个体主义的挑战。长远来看，家户制与村社制的消解是人类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就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家户制仍有极强的韧性，例如，在生产经营上，家户经营仍然是主导性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从社会关系上，家户仍然是重要的社会单元，并为现代国家建构提供组织资源；^①从文化模式上，家户制内含的责任伦理与家国情怀，仍然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观念和意识之中。“传统犹如人体基因，它具有重复性和可复制性。它不可能被简单地消灭，也难以作最彻底的‘决裂’。”^②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

① 徐勇、石健：《社会分工、家户制与中国的国家演化》，《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6期。

② 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① 现代国家的发展、竞争与演进是以长期形成的制度传统为基础和“起点”的，也必然要求将国家治理体系植根于自身的制度传统之中。这意味着，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长期以来形成的制度传统，并探索符合本国历史社会条件的国家治理模式与发展道路。

^① 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